

# 朝廷功令、个人意图与书院志编纂\*

——以清代两种《白鹿书院志》为中心的考察

刘艳伟

**提 要：**有清一代，白鹿洞书院修有两部志书，一为康熙十二年（1673）廖文英所撰《白鹿书院志》，一为康熙五十四年毛德琦所撰《白鹿书院志》。毛志在继承廖志的基础上，对部分内容进行增删、调整，使得新修志书中，程朱之学对书院的影响大增。康熙间朝廷推崇程朱理学的时代背景，以及毛德琦迎合上意的个人目的，是促成毛氏此举的主要动因。对《白鹿书院志》编纂过程的探讨，揭示出的官方意志、个人意图等影响文本形成的因素，为理解书院志、书院历史书写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于反思史料与史实的关系亦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白鹿书院志 程朱理学 阳明心学 历史书写

书院志是以记录书院发展历史、教学管理、祭祀活动、书院经费等内容为主的专门志书，是记载书院历史最为系统的文献。江西白鹿洞书院历史悠久，记载书院历史的志书，明、清两代即有7种，若加上重刊、补刊，数量当更多。<sup>①</sup>康熙五十四年（1715），星子令毛德琦再修洞志，历时5年，于康熙五十九年刊刻成书，名《白鹿书院志》（以下简称“毛志”），这是白鹿洞书院最后一次重修志书。毛志之前，南康知府廖文英修有《白鹿书院志》（以下简称“廖志”），刊于康熙十二年，毛德琦开始修志之时，该志尚存。毛志继承了廖志的内容，但又有所更动，两种志书在文本上有部分差异。

书院志内容丰富，学者们在进行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多将其作为著述的史料基础，用来重建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过程，而对书院志这种文献本身的探讨，仅限于对某种书院志书的介绍、版本的考察，至于书院志背后的社会情境、编纂者的个人倾向、编纂过程等方面，则少有人涉足。<sup>②</sup>本文在比对毛志与廖志的基础上，试图分析同一内容的文本变化，探索造成文本差异的原因及其背后的社会情境、个人意图。

## 一 廖志的内容与学术宗旨

廖文英，字百子，号昆湖，广东连州人，康熙七年任南康知府。<sup>③</sup>其辖境内的白鹿洞书院，在入清之后曾得到江西巡抚蔡士英、南康知府李长春（后升江西按察使）、南康司理朱雅淳等省、府官员的多次维修、增建。至廖文英任官南康之时，记载白鹿洞书院历史的志书，“迄今五十余年，多所阙遗”，廖文英遂“补缀旧文，增葺逸事，授剞劂而登于新”，希望记录下这段修废举坠的历史，彰显地方官员及朝廷作养人才之功绩。<sup>④</sup>

\* 本文为西华师范大学博士启动项目“中国历代书院记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412798）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志考述》，《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9期。

② 参见刘艳伟、邓洪波：《三十年来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高校图书馆工作》2018年第5期。

③ 参见盛元等纂修：同治《南康府志》卷13《名宦》，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④ 参见廖文英：《白鹿书院志·序》，《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册，第870页。

白鹿洞向有修志传统，前人所修志书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思想上，都会影响廖文英对新志的编纂。已知最早的白鹿洞志为明弘治年间鲁铎所修，其书已佚，只存张元祯所作序文。正德年间，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巡视白鹿洞，“考之文纪，则乱焉而无统，遗焉而不备，举乎细而脱所巨，辞繁复而义弗晰”<sup>①</sup>，于是在原有志书基础上，删除繁复，增其未备，编成《白鹿洞书院新志》8卷。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郑廷鹄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南康知府刘廷诰请修洞志，郑氏参考鲁铎旧志与李梦阳新志，因革损益，成《白鹿洞志》（以下简称“郑志”）19卷。<sup>②</sup>万历二十年（1592），周伟重修洞志，名《新修白鹿洞志》（以下简称“周志”），是为白鹿洞书院第四种志书。周志“盖惟缮写旧文而增其未备”，在内容上沿袭了之前的郑志。<sup>③</sup>天启二年（1622），南康府推官李应昇兼理白鹿洞事，再次重修洞志，作《白鹿书院志》（以下简称“李志”）。李应昇所作书院志序文称，白鹿洞志“今所存者，仅学博周君伟所续编”，“翻阅旧志，手自抄录……残碑逸简，颇为缀缉，芜牒滥词，僭从删汰”，可知李应昇所编志书是以周伟《新修白鹿洞志》为蓝本，重新厘订卷次，编辑成书。<sup>④</sup>

明代白鹿洞诸志在内容上前后因袭，在学术主旨上大体一脉相承。因白鹿洞书院为朱熹修复、讲学之地，其后理学繁盛，白鹿洞书院也以理学渊窟相标榜，后来士人视之为朱学圣地。明代尽管王学兴盛，王阳明及其弟子也曾讲学白鹿洞<sup>⑤</sup>，但其地的朱学传统依旧深厚，诸志尊朱趋势也一直未变。<sup>⑥</sup>

入清之后，廖文英所修《白鹿书院志》继承了明代洞志的内容与学术思想。就内容而言，廖文英在序文中称：“旧《志》李忠毅公重订，迄今五十余年，多所阙遗。爰补缀旧文，增葺逸事，授剞劂而登于新。”<sup>⑦</sup>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李志分形胜、沿革、先献、明教、文翰、祀典、田赋七目<sup>⑧</sup>，廖志分目与李志完全相同，只是在李志基础上补充了顺治朝、康熙朝初年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廖志有凡例6条：

一、书院兴于紫阳创立之功，在李宾客上，故特于沿革中详著当年疏礼，标朱子兴复书院始末一条，明之兴复始末一条，国朝兴复始末一条，使兴继可考。

- ① 白鹿洞书院古籍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
- ② 郑廷鹄在《白鹿洞志·凡例》中称：“纂修兼采鲁春室旧《志》、李空同新《志》，可因者一遵其旧，如书院沿革之类是也。可并者并附条下，如形势、石劓附于山川，基址、宫宇附于沿革，姓氏、名宦附于名贤是也。可增者增之，如洞祠、洞规、洞牒之类是也。求其归一，不为苟同。”可知其对鲁铎、李梦阳版洞志的因袭与变更。（白鹿洞书院古籍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151页）
- ③ 参见白鹿洞书院古籍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481页。
- ④ 参见李应昇：《重修白鹿洞书院志叙》，《落落斋遗集》卷10，“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集部，第50册，第335页。
- ⑤ 参见吴国富：《庐山与明代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1—187页。
- ⑥ 明人诸种白鹿洞志都尊崇朱子，书院志中处处体现着这一原则。从称谓上看，编纂者称朱熹为朱子；从材料编排次序上看，将与朱熹相关的公文、信札、学规、诗文置于诸人之前；从人物传记来看，程朱一脉人物传记在比重上占绝对优势；从祭祀上看，主祀、从祀诸人也以程朱一派为最多。这些都是尊崇程朱最直观的表现。
- ⑦ 廖文英：《白鹿书院志·序》，《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第870页。
- ⑧ 李应昇《白鹿书院志》原刊本流传甚少，今所存者为清顺治年间薛所习增补本，《中国历代书院志》所收、《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所据点校底本即为此本。该书卷17“兴洞移札题词”为后来增补，非李志原刊本所有。

二、书院之设本以教士，昭示典训，旧志举洞规、讲义，概入文志，本末无等，今特类集先正格言，标为明教，而序、记、诗、赋仍入文翰云。

三、书院主盟，学术所系，今遍查碑记古籍，列其姓氏以备参考。

四、名家歌咏剗刻几遍，宁简毋滥，敢辞罪我。

五、讲说剿腐、公移繁冗者删，庶免厌观。

六、旧志有外志一卷，旁及名胜，详在郡志，弗录。<sup>①</sup>

《凡例》的第一、二、三、六条涉及廖志的体例与内容，李应昇志既然是如此，唯其未列明凡例而已，廖志因袭李志甚是明显。另外，从称谓、材料编排次序、人物传记、祭祀上看，廖志也是以尊朱为宗旨的。

## 二 毛志对廖志的沿袭与更动

继廖志之后的是毛德琦所修《白鹿书院志》。毛德琦，号心斋，浙江鄞县人，由监生捐贡，康熙三十五年（1696）选授广东始兴知县，后以终养离任，五十三年补授星子县知县。<sup>②</sup>次年，毛氏奉上宪之命，清理白鹿洞洞田，并重修《白鹿书院志》。<sup>③</sup>

白鹿洞志书有多种，至毛氏修志之时，有些志书尚在流传，故前人之志可供毛氏参考，其中，廖志是毛志最直接的材料来源。在《凡例》中，毛氏称：

明弘治七年，张元祜《序》云：洞志编自鲁铎，校自袁端，刻自郡侯郭璠。正德九年，提学李梦阳序云：《志》分六则，首沿革，次形胜，次创建、剗刻，次田赋，次姓氏、文艺，次典籍、器物。万历年间，郡守田瑄重修，乃星子训导周伟主洞事，与洞生熊侯、袁炜等编辑，书最详核。今则仅余残简。郭、李二《志》，更邈不及见矣。天启二年，江阴李应昇定洞志，又分七则，首形胜，次革沿，次先猷，次明教，次文翰，次祀典，次田赋。惟文翰中多从删削，视田志较约。嗣是郡守廖文英洞志，遵江阴原本，其所增入，半属顺治年间郡守薛所习补刻也。廖志成于康熙十二年，全版毁于五十五年。今详请重刊，于七则外增《兴复》以尊朱子，《主洞》以崇师范，《书籍》以昭训守，广为十则，缘序其源流如此。<sup>④</sup>

因洞志收录了之前所修志书的序文，毛氏从中得知有鲁铎、李梦阳、田瑄、李应昇、廖文英所修志书，但周志“仅存余简”，郭璠、李梦阳二志，“邈不可见”，毛氏所能接触到的只能是李应昇、廖文英所修《白鹿书院志》。因廖志“遵江阴原本”，“其所增入，半属顺治年间郡守薛所习补刻也”，除沿袭了李应昇洞志，廖志又增添了顺治年间的内容，记载完备，至毛氏修书之时此书尚存，对重新修志最为方便。毛德琦遂在廖志七目的基础上，“增《兴复》以尊朱子，《主洞》以崇师范，《书籍》以昭训守，广为十则”，修成新的《白鹿书院志》。

毛志虽大体上沿用了廖志的内容与体例，但在修志之时，毛德琦除新增廖志所载书院顺治十

① 廖文英纂：《白鹿书院志·凡例》，《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第872页。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9辑，第50页。

③ 参见蓝煦，徐鸣皋修，曹征甲纂：《星子县志》卷7《学校志》，同治十年（1871）刻本。

④ 白鹿洞书院古籍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1041—1042页。

四年(1657)以后的历史外,也对原书做了不少更动。今以《中国历代书院志》所收廖文英撰,钱正振增补《白鹿书院志》,同《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所收毛德琦撰《白鹿书院志》对比,可见其中的一些变化。

此外,毛德琦在修《白鹿书院志》的同时,重修了《庐山志》,两志成书于同一年,是书卷8专记白鹿洞书院,其中有书院历史沿革、先献、诗文等内容,其所用材料当与《白鹿书院志》相同,这就为廖志、毛志的对比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平行文本。廖志、毛志的主要内容皆由明代洞志而来,现存的明代3种白鹿洞志也可资参考。另外,白鹿洞书院尚有不少明清碑刻遗存,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始材料。这些都便利我们考察毛德琦在编纂书院志的过程中,对廖志文本所作的更动。

廖文英版与毛德琦版《白鹿书院志》对比表

廖志	毛志	备注
(1) 卷1形胜、卷2—5沿革、卷6先献、卷7—9明教、卷10—14文翰、卷15祀典、卷16田赋(《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第873页。此列引文皆出自此书,以下只标页码)	卷1形胜、卷2兴复、卷3沿革、卷4先献、卷5主洞、卷6—8学规、卷9书籍、卷10—17艺文、卷18祀典、卷19田赋(《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1045—1046页。此列引文皆出自此书,以下只标页码)	毛志之前诸志都将宋代朱熹兴复书院之事列入书院沿革,毛志独设“兴复”一目
(2) 卷2《沿革》:“宗儒祠,旧为三贤祠,朱子既去郡,诸生为立生祠于讲堂西,遗书撤之。朱子歿,开禧乙亥,诸生遂以濂溪、二程与先生合祀于讲堂,后废……万历辛卯,知府田瑄以旧文会堂静僻,改置三贤祠。癸卯,提学钱楨又并祀王阳明先生,增陈经归濬配享,仍标宗儒祠。”(第878页)	卷3《沿革》:“宗儒祠,旧为三贤祠,朱子既去郡,诸生为立生祠于讲堂西,移书撤之,朱子歿。开禧乙亥,诸生遂以濂溪、二程与先生合祀于讲堂,后废……万历辛卯,知府田瑄以旧文会堂静僻,改置三贤祠。癸卯,提学钱楨增陈经归濬配享,仍标宗儒祠。”(第1082页)	毛德琦《庐山志》“宗儒祠”条,引《洞志》:“宗儒祠即三贤祠,朱子既去郡,诸生为立生祠于讲堂西,公闻,遗书撤之。歿后开禧乙亥,诸生遂绘濂溪、二程及文公像,合祀于讲堂,后废……万历年间提学钱楨又并祀王阳明,增陈经归濬配享,仍标宗儒祠。” <sup>①</sup>

① 毛德琦:《庐山志》卷8《山川分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史部,第240册,第3页。

(续表)

廖志	毛志	备注
(3) 卷6《先献》:有宋人杨徽之、刘式、刘元亮、蒯鳌、周述、明起、段鹄、孙琛、刘涣、陈瓘、刘恕、周敦颐、朱熹、陆九渊、刘清之、林择之、蔡沈、黄幹、吕炎、吕焘等(第899—901页)	卷4《先献》:宋杨徽之、刘式、刘元亮、蒯鳌、周述、明起、段鹄、孙琛、刘涣、陈瓘、刘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刘清之、林择之、蔡沈、黄幹、吕炎、吕焘等(第1099—1133页)	廖志之前李应昇版、周伟版、郑廷鹄版、李梦阳版洞志先献部分所列人物均无二程、张载
(4) 卷6《先献》:“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倡明正学,以良知为宗。正德辛巳间巡抚南赣,按南康,诣书院,有《独对亭望五老》诗,临行,遗白金五十两于主洞蔡宗充,转属郡增置学田,学者称阳明先生,谥文成。今祀宗儒祠。”(第902页)	卷4《先献》:“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正德辛巳间巡抚南赣,按南康,诣书院,临行,遗白金五十两于主洞蔡宗充,转属郡增置学田,学者称阳明先生,谥文成。今祀宗儒祠。”(第1237页)	毛德琦《庐山志》“宗儒祠”条下有祠中所祀诸人传记,直接撮引《洞志》,其文为:“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倡明正学,以良知为宗。正德辛巳间巡抚南赣,按南康,诣书院,增置学田,学者称阳明先生,谥文成。” <sup>①</sup>
(5) 卷7《明教》载朱熹《白鹿洞规》	卷2《兴复》有《白鹿洞规》,卷6《学规》又收《白鹿洞规》(第1062—1061页,第1153—1154页)	廖志之前李应昇版、周伟版、郑廷鹄版、李梦阳版洞志中《白鹿洞规》皆不重出
(6) 卷8收《方大镇白鹿洞晤语》全文(第913页)	所收方大镇《白鹿洞晤语》中无“阳明先生著《拔本塞源论》,深慨功利熏习入人骨髓,其救世立教之意正与象山先生吻合”35字(第1184页)	李应昇版洞志有此35字
(7) 卷8《明教》:收胡居仁讲义、葛寅亮讲义,湛若水《心性图说》《四勿箴说》《心性总箴二图说》,蔡宗充《洞规说》(第908—912页)	卷7收周子《太极图说》,湛若水《心性图说》《四勿总箴说》《心性总箴二图说》,蔡宗充《洞规说》(第1177—1178页)	毛德琦之前诸志皆无《太极图说》

① 毛德琦:《庐山志》卷8《山川分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0册,第4页。

(续表)

廖志	毛志	备注
(8) 卷11《文翰》收清代兴复书院记文,有熊德阳《重修祀圣殿记》、蔡士英《重修白鹿书院记》、李长春《重兴白鹿书院记》、熊维典《重兴白鹿书院记》、朱雅淳《重建宗儒祠记》(第928—931页)	卷12《艺文》,此部分内容收熊德阳、蔡士英、李长春、熊维典四文,未收朱雅淳文(第1155—1260页)	朱雅淳《重建宗儒祠记》一文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其石刻今存白鹿洞书院碑廊

说明:表中下圆点为笔者所加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毛志在内容与思想上继承廖志,但在具体编纂的过程中,又对所引廖志的部分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对其中的部分篇章进行增删,在文本上,二志显示出了差异。若要了解其中的原因,需对这些不同之处作进一步分析。

### 三 毛志编纂中的崇朱理念

总体看来,上表所列诸条,无论是对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事迹卷次的调整,还是对朱熹及与之相关的道学一脉、程朱理学具体内容的增添,以及对王阳明传记及其学说内容的削减,均显示出毛德琦编纂志书的一种总体趋向:尊崇朱子。

(一) 二志在卷次上的变化。廖志沿革分为4卷,先述唐至本朝书院简史,次述宋代朱子兴复书院始末,再述明代书院兴复事,最后述书院在本朝历史,附主洞于先献目下,附藏书于祀典目下。毛志则将朱子兴复书院始末单列为一目,曰兴复,将唐至本朝书院历史合为一卷,加以编年,将主洞、书籍从先献、祀典中分出,各成一目,如此,就将廖志7目扩为10目,并将藏书移至学规之后、艺文之前,变动了各卷次序。而这些变动中,有关书院历史的“沿革”一目变化最大。廖志“沿革”述书院历史,先总述后分述,分述按时间顺序叙书院在各个朝代之兴衰,井然有序。而毛志则是首列“兴复”,罗列朱熹兴建白鹿洞书院时所发布公文、与他人往来书札、所订学规及其他文献,总朱熹兴复书院事为一卷;合廖志“唐至清书院简史”“明兴复书院始末”“国朝兴复书院始末”为“沿革”,列“兴复”之后,致使早期唐、五代白鹿洞书院史事反在南宋朱熹兴复书院之后。

毛氏自然清楚其对书院历史的纂写有乖前志体例,在“兴复”卷首小序中,毛氏解释称:“鹿洞创自李氏,南唐因之建学,至宋而大兴。迨本朝而益振。然承先启后,功莫逾于朱子。盖朱子所建置,百世之标准也,纂而合之,以示德业,不与众同。”<sup>①</sup>依毛氏之意,朱子兴复书院功大,为后世树立了规范,为了表彰其功,所以列其兴复事迹于沿革之前。

(二) 毛志删万历年间钱褰祀王阳明于宗儒祠事迹。李梦阳《宗儒祠记》称:“宗,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其学也,则各以其趋而归之者为宗……尊之以为主,则各是其

<sup>①</sup> 白鹿洞书院古籍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1054页。

是，彼得与我鼎峙而角立，于是吾之所谓宗者或几乎熄矣！”<sup>①</sup>李氏对“宗”的内涵进行阐释，概括起来，即“宗”具备正统性、排他性。宗儒祠祭祀上承孔、孟道统能代表儒家正统的先贤，周敦颐、朱熹二人是“儒之宗也”，因而能够入祀其中。世人眼中，王阳明所代表的心学与朱熹所代表的理学一直处于对立，若王阳明入祀祠中，一祠之内学分二派，与宗儒祠祭祀儒家正统的原则相背。且白鹿洞为朱熹讲学之地，是程朱之学的渊藪，王阳明从祀宗儒祠中，自然影响正学的地位。廖志与《庐山志》对王阳明从祀宗儒祠均有记载，此事当为事实。毛氏在修《白鹿书院志》之时，为求志书所反映的思想总体一致，应该是故意删除了这段文字。

（三）卷四“先献”部分，毛志增添了张载、二程的传记，并为周敦颐、朱熹重新立传，且篇幅巨大。宋儒周敦颐传，廖志有120字，而毛志以朱熹《濂溪先生事实》为材料，大大扩充其篇幅，将近千言（约936字）。廖志朱熹小传有230字；毛志所收朱子传，达6500多字。张载、二程与书院无涉，无论是廖志还是之前明代各志均未立传，但毛志新增入三人传记，张载传、程颢传各5000言，程颐传达6500言。毛志在周敦颐、朱熹之间添入程颢、程颐、张载，正将朱熹所倡导的道统连接起来。

（四）删王守仁传记“倡明正学，以良知为宗”“有《独对亭望五老》诗”17字。廖志“先献”有王阳明小传，共74字。其中“倡明正学，以良知为宗”是对王守仁的学术功绩的定位，是传记核心所在。毛氏在书院志中以程朱之学为正学，自然不容王阳明的良知之说再称正学。白鹿洞有独对亭，王阳明曾到白鹿洞，作有《独对亭望五老》诗，毛志卷16《艺文》有收录。毛氏删此部分内容，恐怕也不离其消减王阳明在书院志及书院历史中的影响的初衷。

（五）毛志中《白鹿洞规》重出。此前诸志皆无此种情况，这一处理方式与志书编纂通行做法相悖。毛氏对此解释称：“窃念儒者为学之方，圣贤教人之法，莫要于此，故复冠于卷首，用以尊朱子之道，致丁宁之意，非复出也。”<sup>②</sup>直言其目的是为尊朱子，致“丁宁之意”。

（六）卷7《方大镇白鹿洞晤语》，毛志删“阳明先生著《拔本塞源论》，深慨功利熏习人人骨髓，其救世立教之意正与象山先生吻合”35字。方大镇，字居静，号鲁岳，桐城人，其父方学渐为明代桐城理学大家。其学说一本其父性善之说，但又能调和诸家，择善而从。<sup>③</sup>在《白鹿洞晤语》中，方氏论述道学与举业的关系，称赞王阳明《拔本塞源论》中的救世立教之意与陆九渊在白鹿洞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的主旨相合，本无不妥，而毛氏在修志之时则把这部分内容删除，其用意或也是为了削减王学的影响。

（七）在湛若水《心性图说》《四勿总箴说》《心性总箴二图说》之前增《周子太极图说》。嘉靖十年（1531），南康知府王溱刻湛若水《心性图说》《四勿总箴说》于书院墙壁，《心性总箴二图说》为嘉靖十七年江西布政使左参议王慎中请湛氏为书院所作，皆与书院直接相关，而周敦颐《太极图说》与书院并无关联。可以想见，毛氏增加此篇不离其“崇正学”的初衷，很可能湛若水阐发其心学思想的《图说》引发了毛氏对程朱之学相关内容的联想，于是将《太极图说》增入，既在书院志中增加程朱之学的内容，也可以稀释心学在整个书院历史

① 廖文英纂：《白鹿书院志》卷11《文翰》，《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第925—926页。

② 白鹿洞书院古籍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1154页。

③ 有关方大镇的学术思想，见彭战果：《无执与圆融——方以智三教会通观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中的影响。

(八) 删朱雅淳《重建宗儒堂记》。宗儒堂，原为三贤祠，是书院祭祀先贤的一个场所。明正统间南康知府翟溥福建，祀朱熹、李渤、周敦颐，以陶渊明、刘凝之、陈了翁、刘道原配享。弘治十一年（1498），提学苏葵改祀李渤于别室，只祀周、朱二人，后提学邵宝配以朱子之从游于洞者14人，赵渊并祀陆九渊，易名宗儒祠。万历三十一年（1603），提学钱檣又增祀王阳明。清顺治十四年重建为宗儒堂，祀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四先生，以林择之、蔡沈、黄榦等15人配享。<sup>①</sup> 有关宗儒祠（堂）的文献，廖志收有明人杨廉《宗儒祠记》、李梦阳《宗儒祠记》、清人朱雅淳《重建宗儒堂记》，而毛志只收杨、李二人记文，未收朱文。

朱雅淳，字湛侯，浙江余姚人，顺治十八年（1661）在南康府推官任上，主白鹿洞事，修葺宗儒堂，作有《重建宗儒祠记》。之前的两篇《宗儒祠记》，杨氏盛赞周、朱二人为真儒，从祀诸人如黄榦等为醇儒，述成儒之道，劝勉书院诸生。<sup>②</sup> 李氏在文中称述周、朱二人上接孔孟道统，倡明先圣绝学，是为儒宗。<sup>③</sup> 而朱雅淳则称：“世有宗儒，帝王、圣贤之道统系焉。然孟子死而汉唐不得其传，惟宋始有大儒，更越代而姚江继之，其宗百世不祧矣。”其言外之意，王守仁实继承了自孟子以后的道统。对周敦颐、朱熹与陆九渊、王阳明之间的学术差异，朱氏表现出调停的态度。至于世人对王学近禅的诟病，朱氏以天泉证道的典故进行了驳斥。<sup>④</sup> 作为王阳明的同乡，朱雅淳此文很容易让人产生左袒乡贤的联想，更为重要的是，他以阳明上承孔孟道统，为王学辩护，其文章所阐发的主旨与杨、李二文抵牾。朱氏此文在当时即被刻石，该碑文至今尚存白鹿洞书院，不难想象，毛氏修志之时是有意删除了此文。

根据前文表格内容分析廖、毛两种志书的文本差异：（1）表现为卷次内容的调整，为尊朱子而不遵从志书编纂中的时间逻辑。（5）为表彰朱子之功，违背志书编纂的通例，致使《白鹿洞规》重出。此两条可归为一类，即尊朱熹而对之前修志体例的违背。（3）（7）增入与书院并无关联的人物传记、图说，以构建儒家道统序列，扩大程朱之学在书院历史中的影响。（2）（4）（6）（8）则表现为对王阳明及与之相关的内容的删减，削弱王阳明及其学说在书院历史中的地位。以上无论是对修志体例的更动，还是对具体内容的增删，毛氏在修志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的一个原则即是尊朱子，崇朱学，修志的过程，也即其贯彻这一原则的过程。

#### 四 朝廷学术指向、个人动机对毛氏修志的影响

尽管廖志同毛志都显示出尊崇朱子的倾向，但因康熙皇帝在位的不同时期内，朝廷文化政策有不同，功令之下，同为官员出身的廖、毛二人自然紧跟形势，表现出修志目的的不同。

康熙初年，朝廷主要致力于抚平战乱给社会带来的创伤，对思想学术关注有限，并未加以引导。康熙十二年廖文英修志之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清初江西地方官员兴复书院的历史，宣扬朝廷养贤育材之意。廖文英贡生出身，明末任南康府推官，后降清，康熙初年被任命为南康知府。其著述除《白鹿书院志》外，唯有《正字通》一种，与理学并不相关，廖志、毛志及同治年间所修《星子县志》《南康府志》所收廖氏所作序、记文，也罕有对理学思想的阐发，可见其

① 参见廖文英纂：《白鹿书院志》卷2《沿革》，《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第878页。

② 参见廖文英纂：《白鹿书院志》卷11《文翰》，《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第925页。

③ 参见廖文英纂：《白鹿书院志》卷11《文翰》，《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第925—926页。

④ 参见廖文英纂：《白鹿书院志》卷12《文翰》，《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第928—931页。



并非理学学者。在编纂书院志的过程中，他“即旧志修辑，以成是书”<sup>①</sup>，承袭了明代白鹿洞诸志的内容与思想，并未在其中过多掺入自己的意志。因王学兴盛对朱学势力的削弱，即便是作为朱子过化之地的白鹿洞，对程朱之学的尊崇尚有限度。廖文英继承前志，在修志的过程中，对程朱一派并未多加笔墨。

至毛德琦任星子令之时，情况已大不相同。康熙皇帝喜好理学，参与理学书籍的编纂、刊刻，重用理学名臣，至晚年，对朱子更是推崇备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圣祖下诏将朱熹升入孔庙十哲之次；五十四年，康熙帝令李光地编纂《性理精义》，程朱之学可谓是如日中天。<sup>②</sup> 朝廷对朱熹的褒扬，对程朱理学的倡导，恐怕当时任何一位官员都会意识到。况且毛氏于康熙五十四年修志之时，朝廷表彰朱熹的余音尚在，这不可能不对他的修志行为产生影响。<sup>③</sup>

如果说康熙一朝官方对程朱理学的尊崇是影响毛氏修志行为的政治因素，那么毛德琦本人对朝廷之意的迎合，则应该是促使志书呈现最终面貌的个人原因。毛德琦在被任命为星子令之前，按照当时外官授官的惯例，由吏部官员引见给康熙皇帝。毛氏作有《纪恩诗》并序，对此事记载甚详：

甲午，琦补授星子令，引见澹宁居，天颜悦豫，顾铨臣曰：“星子县尔等曾到否？朱子讲学在此。”复顾琦曰：“此人去得。”琦自念一介小臣，藉先贤过化之所，邀圣恩之一顾，深以不克负荷是惧。感激之余，恭赋《纪恩诗》二首：

临轩一一眷循良，恩逮微臣亦对扬。岂有通才邀注问，恰因胜地示周详。山灵重见真儒业，道德犹传旧讲堂。此去祇承天语切，敢教草树闾清光。（其一）<sup>④</sup>

毛氏以“微末外吏”，能借先贤过化之地，“邀圣恩之一顾”，诚惶诚恐。康熙帝命其为白鹿洞书院所在的星子县知县，毛氏受宠若惊，思报皇恩。《纪恩诗》是对自己得皇帝召见之事的记述，尾句“此去祇承天语切，敢教草树闾清光”一句，表露出不负皇恩，振兴朱子过化之地的志向。到任之后，毛德琦浏览书院志，“释菜有器，惧其隘也，则称之；禄土有田，惧其漏也，则清之；核书籍，惧其逸而不备也；严考课，惧其荒而不奋也”<sup>⑤</sup>，对作为朱子讲学之地的白鹿洞书院甚是重视。因廖志版毁，毛德琦借重修院志之机，迎合朝廷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

除了《白鹿书院志》，毛德琦还编有《庐山志》一书，刊刻于康熙五十九年。同《白鹿书院志》一样，该书也是在前人志书基础上汇订而成。毛氏在序文中称，“况我皇上眷顾兹山，扶輿磅礴，御书宸翰，宠锡频加。一时名公硕士，扬休挖雅，炳炳琅琅”，提及康熙皇帝对庐山的恩宠。在凡例中，毛氏列有“增入”一项，他解释此目之设置时称：

①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第1038页。

② 参见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8—42页。

③ 《白鹿书院志》收录了朝廷发布的朱熹升配十哲的公文，毛氏将其列入卷11《艺文》之首，也可见升配之事对他的影响。（白鹿洞书院古籍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1228—1229页）

④ 被康熙皇帝召见一事，毛德琦作有《纪恩诗》，诗前有序，述引见之事，表达报恩思想。《纪恩诗》及《序》，毛氏所纂《白鹿洞书院志》《庐山志》中均有收录。

⑤ 白鹿洞书院古籍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1036页。

桑吴之志，版未贮公，书不广播。且近今巨典概属阙文，如我皇上于白鹿洞颁书锡匾，秀峰寺颜额赐诗，其增重名山较之徒祭加封更为光大。书院已订专志，山寺艺文原称“开先”者仍题“开先”，后改“秀峰”者概称“秀峰”，谨备载以昭旷典。<sup>①</sup>

以康熙皇帝对白鹿洞书院赐书赐匾，为秀峰寺题额赐诗诸“巨典”未能载入为遗憾，特意增入，以昭旷典，也是借编纂山志称颂皇帝恩德。由此不难看出毛德琦作《庐山志》之时迎合上意的动机。《庐山志》《白鹿书院志》同出毛德琦之手，且成书时间相同，《庐山志》中表露出的纂志意图，也可为我们了解毛氏编纂《白鹿书院志》的个人目的添一佐证。

朝廷功令尊程朱，毛德琦逢迎上意，这决定了毛氏的纂志意图。在书院志的序文中，毛氏称其修志“用以敷扬皇上德政之弘，阐明朱子理学之正，俾天下向往者知所矜式”<sup>②</sup>，明确地表示其作此志的目的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政，阐明朱子正学。新形势之下，作为修志材料来源的廖志已不能完全符合毛氏修志的需要，为使新修的志书更符合朝廷功令，能够迎合上意，毛德琦对廖志的体例与内容进行了调查，他笔下的白鹿洞书院历史，程朱之学的影响大大增加。

## 结 语

在白鹿洞书院的历史上，朱子之学、阳明心学在白鹿洞都有传衍。<sup>③</sup>毛德琦编纂《白鹿书院志》时，受朝廷功令、个人意图影响，在文本上对之前的内容进行更动，使得新修志书中，朱学呈独尊之势，王学晦暗不显，这是对白鹿洞书院历史一次新的书写。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个人之思想、行为难以脱离其所处时代的影响，社会和时代引导、塑造人们书写文本的内容与方式。在历史编纂的过程中，面对众多的史料，编纂者通过对材料的选择、更动，书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历史，以达到书写者的目的与意图。通过比对分析清代两种《白鹿书院志》的文本，揭示出朝廷功令、个人动机等影响文本形成的因素，也再现了文本的编纂过程。这不仅为理解历史书写、探求历史真相指点迷津，还呈现出特定历史时期学术思潮、士人思想的现实图景。对我们重新思考文献的价值、反思史料与史实的关系，亦具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毛德琦：《庐山志·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9册，第570页。

② 白鹿洞书院古籍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1035—1036页。

③ 有关白鹿洞书院的学术流传，参见吴国富：《庐山与明代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4—5章。